

地景、生态与宰制性社会

——钟理和的《笠山农场》再考察

赖清波

内容提要 环境议题在今天备受关注，钟理和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创作的《笠山农场》中前瞻性地书写了人与自然的共生。笠山农场垦殖行动的失败，是建立在日本会对台湾种植农场主的不平等压榨上，展示了殖民地经济如何被迫卷入帝国主义跨国资本的流动，也显现日本帝国对殖民地台湾的“生态宰制”。《笠山农场》蕴含了钟理和对日本殖民体制的批判和现代化进程的思考，透过不同人物对待土地的态度，彰显了人与“土地社群”互赖共生的环境伦理。

关键词 钟理和；《笠山农场》；地景空间；生态殖民；环境伦理

前言

《笠山农场》是钟理和（1915—1960）唯一完成的长篇小说，构思于 20 世纪 40 年代的北平时期，完稿于 50 年代的台湾，是台湾文坛在“反共浪潮”中为数不多不以“反共题材”进行创作的异数。

《笠山农场》以钟家为创作蓝本^[1]，描写的是 20 世纪 30 年代日本殖民统治下台湾农场主的垦殖行动^[2]。小说讲述刘少兴买下笠山，此山头之前由日人的拓殖会社与当地的南海会社经营，均宣告失败。刘少兴经日本朋友的引荐，由专门培育咖啡苗的高崎农场指导，决定种植咖啡以寻求最大的利润，却因缺乏种植经验，咖啡染病大量死亡，垦殖行动失败。农场少主刘致平爱上女工刘淑华，因两人同姓，遭到家人的严厉反对，便背井离乡来到日本。

由于钟理和的成长背景和跨域经验，以往评论者在分析《笠山农场》时，大都着眼于写实风格、同姓婚姻、客家社会变迁、反封建礼教等角度来解读。本文将《笠山农场》为考察中心，结合钟理和相关的文学作品，以生态批评的角度从人与自然、人与土地互动的关系来分析这部作品，试图探

讨笠山农场垦殖失败的原因，以及小说潜藏的自然观，思考地理空间在形塑作者的乡土认同中发挥了何种作用。日本会社不顾台湾的自然地理环境，怂恿台湾农场主栽培咖啡作物；一方面可看作日本掠夺台湾自然资源为殖民体制服务，另一方面，亦可看作日本殖民者通过咖啡这一外来舶来品，将殖民地经济卷入跨国资本的流动，深刻体现了日本帝国对殖民地台湾的“生态宰制”。本文将从这些思考谈起，指出钟理和在看似田园牧歌的抒情笔调中隐含了他对日本殖民体制的深层控诉和批判。

一 地景想象：作为文化地理空间的美浓

“我们叫做开始的往往就是结束 / 而宣告结束也就是着手开始。 / 终点是我们出发的地方。”^[3] 钟理和在日本殖民经验、祖国经验的相互激荡下，游移在两岸文化场域，最后回到美浓，把美浓当做一生的栖所，直至病歿。美浓的环境给他生命的滋养，他的血肉也与美浓融为一体。

小说中的笠山浸染了浓郁的“地方色彩”与“风土人情”，是台湾浪漫“乡土写意（讴歌）派”书写的开端^[4]。在刘阿五的劝说下，刘少兴来到

了笠山,看到“两岸的乔木,环拱如盖,下面清风低回。藤长而大,状似虬龙,一直垂到地面”^[5]。虽吃着只放豆豉的鱼汤,他却觉得无比鲜美,是“近年来难得有的快乐一天”。笠山优美的风光,以及血液里的老庄思想,让他想起早年漂洋过海的艰辛、起落无常的商情、繁杂的政商关系,种种意念让刘少兴生出退隐山林的念头。

刘致平起先对笠山一望无际的大营林颇感不舒服,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地被这里打动。中国画上的那种依山傍水、与世无争的田家风景,在美浓浑然天成。笠山在钟理和笔下宛若人间仙境,“使他对这地方起了一种如遇故人的温暖和亲切之感”^[6]。笠山不仅是人民的养育者,作为一种地景(landscape),也有心灵抚慰的作用。它提供人们野餐所需的鱼、水、木材等食物,是心灵休憩的所在。对美浓景致的书写,也表现了钟理和超越同时代作家的文字能力。写到美浓/笠山,钟理和都怀着一股深情:

春已在这些树林中间,在凄黄的老叶间,又一度偷偷地刷上了油然的新绿,使得这些长在得天独厚的南天之下的树木,像懵然不知自然界中有循环交替的法则,蓬勃而倔强地又燃上了旺盛的生命之火。^[7]

岩石间,长着一绺一绺的青草,像女人的毛发纤细,溅着水花,湿漉漉地,发着绿色的柔光,像在为自己的生命的高洁和清静,而欢欣鼓舞。^[8]

这种舒缓田园牧歌的情调,使读者几乎感受不到日据时期台湾社会的脉动。钟理和因此常被人批评为“抵抗精神不够”“时代环境不明”,并被认为是“这一篇作品忽略了许多重要的东西”“好像企图在逃避什么”^[9]。《笠山农场》更多采取抒情的文学风格,来表现钟理和的由内而外的感觉以及个人生命经验的省思。彭瑞金在评论《笠山农场》时,从人与土地的角度切入,指出笠山农场“无疑是个遥远而古老的世界”“像一幅太古先民的耕樵图”“表达出葛天氏之民的生活理想”,并点出《笠山农场》的美,便美在“这种生命情调与自然的交融”^[10]。陈惠龄从“乌托邦的叙事美学”来讨论钟理和的“风景”发现,认为其显示了台湾乡土文学的乌托

邦特质及其个人特有的抒情性意识,并兼具社会话语和审美话语,应可视为一种不同社会观念形态与书写美学范式^[11]。彭、陈二人皆不约而同点出《笠山农场》里的美浓在钟理和笔下犹如桃花源。小说中有大量的段落对美浓风景加以描摹,甚至在描写刘致平与陈淑华由于情欲流动而冲破传统礼教的原始激情时,钟理和也浓墨重彩地对蝉鸣躁动、热气倾泻的夜景进行铺排,营造原始、狂乱、焦躁的气氛。美浓不仅成为钟理和对地景空间的呈现与表征,也是作家审美化的生活体验。

在此,笔者想谈谈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环境史”研究,其中著名的代表人物唐纳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将环境史的研究范畴分为三类:一是自然本体在历史上之组织结构及其功能;二是社会经济领域与环境之互动关系;三是人类对环境的价值、伦理与意识形态之研究,这是属于与人类心智相关的诸如知觉、伦理、法律、神话以及其他意义上的结构型态之研究,专注于个体或群体与“自然”之间的对话关系^[12]。可以看出,环境史不仅将历史研究深入人和社会的各个层面,更深入土地本身,探讨人和环境互动的各种方式。换言之,环境运动是影响历史变迁的一个重要因素。人的历史和自然变动的历史不应分开叙述,而应放在一起考虑。人类的活动不断地影响自然,同样,自然的变动反过来影响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学者——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在研究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地区时,认为“自然”在形塑地中海地区的人类活动及行为、文化和社会中扮演重要的作用,“自然”对地方文化产生影响,这些影响反过来也对国家和社会发生作用^[13]。

批判地理学者哈维(David Harvey)曾提出“地理学想象”(Geographical Imaginal)这个概念。在他看来:“‘地理学想象’的作用在于使行动者本身得以确认自然、空间、地方等地理学要素在他们社会生活中的关键地位。同时,透过这样的认识,将生活周遭的空间与环境有意义地串联起来。这个有意义的串联基础,基本上是来自体会到人与人之间,或是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因缘际会,乃是由于那些影响着他们的环境与空间造成的。”^[14]也就是

说,自然、空间、地方等地理学要素在作家创作活动中占据重要的作用,地景具有文化建构的行为。钟理和透过身体对环境的感受力,使身体与周遭环境糅合在一起,相互活化,彼此赋予生命。美浓成为建构出个人记忆/社会记忆与自然环境相互结合表现的时空场域,不仅是故事发生的再现空间,也是表现地方的地形地景与人文生态变化发展的基点。自然环境与当地民风民情的塑造有极大的关联,并制约着新思想的传播:

这种因袭而保守的生活态度,大概和地理环境不无某些关联。这地方三面环山,交通闭塞,与外界较少接触,只靠一条糖厂的颠簸不平的五分车和相隔三四十公里的纵贯线相接,因此文化交流无形中受到限制。在这里,时间如果不是没有前进,便像蜗牛儿一般进得非常之慢。一切都还保留得古香古色,一切都呈现着表现在中国画上的生活的静止。仿佛他们还生活在几百年前的时代里,并且今后还预备照样往下再过几百年。^[15]

美浓的自然地理环境形塑着在地居民的性格和行为,“朝气蓬勃而富有创造的气概”消泯,代之而起的是迂腐的传统和权威思想的抬头。正因为交通如此闭塞,与外界交流匮乏,“同姓不婚”的宗教伦理在客家族群的文化传统中根深蒂固,因此即使刘淑华怀孕,族人仍不允许她和刘致平结婚,逼迫她改嫁或者堕胎。以血缘为纽带建立起来的“神圣关系”,像无处不在的网,使人无所逃遁。这迂腐的传统导致刘致平为了爱情带着淑华远走他乡。当地妇女的衣着以及发髻长久以来没有改变,“还梳着奇形怪状的面线髻,穿着安了华丽的色彩阑干的蓝布长衫”^[16],这种伴随着客家移民第一代到台的装束,是满清遗留下来的文化形式。但在下庄,年轻的妇女都已改穿简便美丽的花布短袜。自然环境的闭塞,造成美浓民风的极度保守。

如果离乡是一种肉体的漂泊,返家则是一种精神的回归。钟理和在战后从北平返回美浓,这里传统的民风民情对他的“同姓之婚”并不认同,但美浓的自然山川,又成为他精神的滋养和创作的源泉,美浓也是他“地理想象”的起点。在“白色恐怖”的年代,当文学园地充斥着迎合当道的“反共

文学”“战斗文学”“歌功颂德文学”的政治宣传色彩时,钟理和却始终保持着作为一个文学者的纯粹,远离政治潮流,拥抱美浓山川大地,回归个人生命历程与家族史的经营。钟理和对美浓山川的歌颂,一方面是对土地空间格局的真实回归,另一方面也凸显人类向“自然”回归的内心渴望。

二 生态殖民:日本帝国对殖民地台湾的生态宰制

环境史学家克罗斯比(Alfred W. Crosby)跳脱传统,从政治宰制、经济剥削,以及文化霸权的角度来论述殖民文化。在他看来,从生态环境上改变殖民地,更具有隐形造化的力量,对被殖民者“失语”与“失忆”的认同危机造成更深远的影响。

克罗斯比以生态景观的改变来解释欧洲帝国主义的扩张。英国等强权国家以制度和经济的优势、卓越的航海技术和优良的军事武器大肆掠夺殖民地。欧洲人携带的天花、疟疾等疾病快速传播,使得缺乏免疫力的美洲原住民人口锐减,从而瓦解军事的有力抵抗,以致欧洲短时间内成功夺取殖民地。与此同时,欧洲帝国大力破坏殖民地的生态系统,引进欧洲的动植物,使殖民地整个地景欧洲化^[17]。1840年,英国甚至欺骗没有土地所有权概念的毛利人签署“怀唐伊条约”(Treaty of Waitangi),使他们失去广大的土地。从此,新西兰变成英国的新牧场。在19世纪至20世纪之间,一望无际的草原和牛群、羊群、玉蜀黍成为新西兰的新地景。新西兰的原生植物群落大多消失,被欧洲移入的各种植物取代,动物群落也遭遇了一次大毁灭^[18]。生态版图的改变,让原住民失去原本熟悉的生活方式,转而接受殖民者引入的新生活方式。“这种从环境、生物群落、生活模式的彻底殖民方式,便被学者称为生态殖民主义(Ecological Colonialism)。”^[19]殖民史不仅改变人类文化与政治的版图,也改变生态的版图。

世界物种的大交换始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1492年,在此前的新旧两世界,各自拥有全然不同的栽植作物群^[20]。咖啡最早种植于非洲埃塞俄比亚,在台湾的历史可追溯至1884年,英国德记

洋行率先在台湾种植咖啡以供出口^[21]。1895年,台湾成为日本殖民地时,德记洋行台湾分公司的所有权和管理都被移交给日本。日本继续在台湾种植咖啡,直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把大量的台湾劳力派去其他战场才停止^[22]。日据时期,日本政府对台湾的咖啡种植产业颇为热心,对咖啡的产值调查、咖啡的栽培、病虫害的防治等都做了相关研究。比如1924年,“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就出版了针对台湾生长的热带林木的详细调查报告,内容包括咖啡、可可、橄榄油等嗜好品作物的来源、性质、造林法以及其他介绍^[23];1937年,“台湾总督府中央研究所农业部汇报”第百二十六号中刊登文章,介绍了台湾是适合栽培咖啡的主要产地,日本国民的嗜好与经济上的高获益对于台湾的咖啡产业极为有利^[24]。为提升栽培质量,日本殖民当局指示恒春林业试验所针对台湾咖啡树害虫进行详细调查,并提出咖啡树害虫防除法的对策及注意事项;1938年,《台湾金融经济月报》刊登《台湾咖啡栽培的现状与未来》,较为详尽地介绍了台湾咖啡种植的现状和产业的未来^[25]。

现在我们回头看《笠山农场》中种植咖啡的行为,刘少兴之所以选择种植咖啡是因日本朋友告诉他,日本每年必须付出巨额外汇向国外买咖啡,除了为他计算种植咖啡的利润,也大力介绍日本移民在巴西种植咖啡取得的辉煌成就,于是怀着对巨大利润的憧憬,在日本高崎农场的指导下,刘少兴开始了种咖啡之旅。但刘少兴未能清楚地意识到,日本政府为了殖民地咖啡产业发展,大肆向台湾人渲染巴西日侨咖啡种植事业,以达到日本所制定的“工业日本,农业台湾”的发展策略。这一看似美丽的计划中掺进传奇性的夸大和妄想,与事实相去甚远。我们可以看出,殖民地下的台湾商人,由于政治上的被殖民,经济上亦无法自主,无情地被卷入帝国主义经济资本的跨国流动,连地处南部的边陲小镇,也无法幸免。就当时台湾资本家阶级的结构而言,概可分为日人与台人,其中台人又分为从属于日本人经营者,以及与日本资本家对立者^[26]。刘少兴听从日人高崎农场鼓吹而栽植咖啡,由此可判定他是从属于日本人之经营者。此亦小说指摘刘少兴彻头彻尾是“现实主义者”之故,不仅缺乏咖

啡相关知识,亦不甚熟稔现代农场经营管理,最终酿成儿子刘致远被杀的惨剧。

这种垦殖方式,改变本地种植习性,放弃传统畜养牲口的山林改种外来经济作物,又不遵循土地的休耕和利用。“让牲口去把营草践踏光了,然后往干净的地面种植——既省事,又省钱!该死的经济造林法!”^[27]这种大规模的林相改造,使笠山失去了原先让刘少兴陶醉的自然风光,成为本地的陌生地景。在此,笔者想借用环境史学家戴蒙(Jared Diamond)在《大崩溃:人类社会的明天?》一书曾提及的“景观失忆”(Landscape Amnesia)这个概念来阐释笠山/美浓地景的变动。戴蒙认为在景观改变的过程中,虽然每年的景观变动不大,但五十年后地景已和五十年前是截然不同的风貌,因此人们已完全忘了五十年前该地是什么样子^[28]。把时空置放在美浓,美浓的开垦始于乾隆年间(约1736年),林丰山、林桂山带领一批六堆的团练伙伴,从屏东越过老浓溪,来到美浓山脉下的弥浓庄垦殖。到日据时代,日本人为消解乡愁,将弥浓改为“美浓”^[29]。日本为实现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将台湾视为日本战略物资供应站。1935年,日人在双溪坑附近整地,引进南洋树种试种,名为“竹头角热带树木园”,同时大量除去原生植物。质材坚硬且具弹性、成材快的铁刀木成为种植的主要树种,日人将其制成抵抗枪弹后座力的枪托与运载殖民地资源的铁道枕木。铁刀木的种植,因缘际会引来淡黄蝶的聚集,这在后来的1992年还将发生美浓反水库保育运动。换言之,为供应战争物资的需求,日本殖民当局的强势介入已使美浓的植被发生大规模变动,呈现与早期垦殖截然不同的自然景观,这恰恰是台湾遭受日本殖民政府掠夺岛屿资源,人文和自然风貌不断变更的真实写照。

其次,咖啡非本地的经济作物,也不是本地人民生活日常所需。当刘少兴许愿等以后请大家喝咖啡,农人的反应是“咖啡,我们没喝过,我们倒喜欢喝几杯白酒”^[30]。他们对种植咖啡的行为也存在种种疑惑,但抱着对“头家”信任的态度而盲目种植。当赵丙基问张永祥:

“你喝过,永祥?”

“没有!”张永祥羞愧地摇摇头。“我也是

听他们说的。他们说外国人全喝这个。”

“哦！那么我们是给外国人种的喽！”

“管它是给谁种的，只要有利益，叫我做什么都行。”^[31]

换句话说，咖啡种植是借由国际贸易得利，而这种贸易，建立在日本会社对台湾种植农场主的不平等压榨上。日本会社掌握着咖啡种植的相关科学知识，却不顾台湾的具体地理环境和社会文化需求，怂恿台湾农场主投入种植。如果咖啡种植在殖民地台湾推广成功的话，显然可以为日本省去大笔外汇购买支出，为帝国积累巨大的财富。以当时的时空环境，咖啡的引进条件还不成熟，除了尚无成功的案例可供借鉴，当地亦无有经验的技术人员，技术的支持全部依靠日本高崎农场的片面之辞，缺少合理的评估。我们可以看出，刘少兴种植咖啡的决定比较草率，他以务农的常识，以为有土、种子、水、阳光就万事俱备，加上高崎农场的大力宣传，就认为种咖啡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并且获利很大。刘致远甚至觉得咖啡看着虽不够神气，但将来会长出金子。刘家对咖啡的认识来自日本会社有目的的灌输，非常片面而有限。再者，台湾的气候和中美洲并不完全相近，庶民文化对咖啡还非常陌生，人们既没见过也没听过咖啡，把它想成碧眼黄发，如同外国女人。

因此，这种未经科学合理的评估便引进外来物种的大规模开垦的方式，初期对当地的生态圈造成重大的冲击也就毫不意外了。一个新物种的引入，适合当地的水文条件，大都需要一个过程。也许刘少兴种咖啡的行为是出于希望能带动地方致富的念头，但这种垦殖方式，显示了这样一种情境：“在跨国经济、帝国主义促成的‘世界性交流’的过程中，我们的土地在某种程度上被迫在短时间抛弃原来的面目。”^[32]《笠山农场》中的咖啡种植，显示了一种致力于发扬植物学与帝国的共生关系的“殖民植物学”（Colonial Botany）^[33]，日本希望在台湾移植咖啡这种经济作物，目标就是将生产牢牢控制在自己的势力范围，保障商品的供货渠道，以牺牲殖民地的环境为代价，为殖民体制服务。叶石涛认为，日据时代的作品或多或少都会涉及殖民地统治的悲惨现实，唯独在《笠山农场》中没有反映^[34]。

这种观点显然是值得商榷的。试问以外来植物栽培造成地景变动和生态平衡的失调，进而危及底层人民的生活，难道不是殖民地统治的现实反映？小说的结尾，工人因垦殖失败，被迫离开主人家，生计无着落，就是对此的证明。

三 对待土地的态度：从“宰制”到“照管”

美浓人对山的认识，是一个缓慢成长的过程。“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它只是采樵，打猎，或者好事家游玩的地方，除此之外，就不知道有别种用途了。”^[35]显然，“山林保育”“水土保持”等生态理念并不根植于当地庶民文化。然而，在经历垦殖的失败后，在地居民逐渐认识到生态圈的重要，其态度由对土地的“宰制”转变为对山林“照管”。

“你可以感到有一种力量，那在必要时能够移山倒海，能够使自然改观的力量，恰如蜘蛛网一般牢牢统治着这里的一切。”^[36]笠山由有着“一望无际，莽莽苍苍的大营林”被改造成“裸露的褐色地皮”，遍植咖啡林。这里透出了一个清楚的讯息：人是自然的“宰制者”/“统治者”，依靠人力和现代化机械对自然进行统治和改造。弥尔布雷斯（Lester W. Mibraith）曾提出“宰制性的社会（Domination Society）”概念，他认为这种社会形态是遵循着以“人”为主要的关系焦点，为了人类的利益去“征服自然”的“经济至上主义的社会模式”^[37]。对笠山的垦殖，笔者认为可以放在这样的脉络中诠释。刘少兴进行咖啡种植，更多是希望从中获利而进行“林相改造”和“地景变换”。

笠山开垦的过程，与当地居民发生诸多冲突，在当地居民的眼里，山是大家共有的财产：“过去，这地方一直公开于本地的居民，只要你需要或喜欢，就可以随便进来，不受任何人管束。虽然在名义上它是有所归属，但实际则无人理管。”^[38]在地居民没有“所有权”观念，他们认为山一直在那里，竹木黄腾是自个儿生长在山里，是供给在地居民使用，谁都不能占为己有。山是有主人的，这在他们的知识体系之外，进出笠山由自由的行为变成受到禁止，令他们无法理解和接受，因此他们对

笠山农场表示种种敌意。刘少兴为了不过分刺激居民的感情，放宽禁例，有限度地允许他们进出。但是，他的宽大为怀并没有得到善意的报答。为了鼓励承租人踊跃参与笠山农场的垦殖，他默默隐忍“租地内的柴木归承租人砍卖”那样不合理的条款，导致某些承租人如赵丙基把租地内的柴木盗卖完后，弃地而逃；福全带领秃尾母狗入山巡视，却被三个偷笋的壮汉绑在树下；甚至大儿子刘致远因稻田排水事件被何世昌用锄头击伤脑袋，失血过多而不治身亡。刘家拥有土地的所有权，却也是最大的受害者。彭瑞金指出《笠山农场》呈现了严肃的人民与土地的关系，具有人民生活史、土地变迁史的意义^[39]。也就是说，随着日本殖民统治带来的现代化，“土地所有权”使旧的地主与劳动者间的关系面临冲击，新的契约关系使过去依凭对共同的土地信念而维持的主仆关系、承租户关系面临瓦解，而地处南部的闭塞的客家社会，人民仍固守着农业社会的思维，未赶上时代的变局。

土地是需要维护的，在刘少兴的新屋落成之际，何世昌言谈间充满尖刻嘲讽、执拗和不妥协性，却也无意说出应该对待山林的态度：“山，不比平地……它像个小孩，处处要人小心照管，一时照管不到家，一切就都要白费力气。”^[40]但是，显然笠山并没有得到正确的“照管”，当地人把小树林砍光，夹菅草里运出去卖，原本刘少兴希望把小树林保留下来，日后长大可以成为再伐林地，这种“经济造林”的想法也就变成天方夜谭。

本地居民的破坏林相的行为，造成的危害则直接加诸自身。钟理和在1946年从大陆返台后写成的《故乡》系列，对于自然环境的衰败，有无可奈何的谴责。《竹头庄》描写旱灾肆虐的农村，加上日本殖民当局税制的加重，农民生活极度困苦：“日本人税捐抽得重，老天爷又不肯帮忙；前年下了一秋雨，稻子烂在田里，没收得几粒；去年打六月起，就滴雨没放下，干得石头也裂了缝……连番薯签也就别想吃——”^[41]在《山火》中，由于对大自然“神力”的畏惧，乡民生怕到了秋天，天火烧下来，竟先纵火企图把天火顶回去，他们以疯狂而无知的手段，烧掉一二百甲辛苦培育的山林。

“山像小孩，时刻要人保护，十年种树，也经

不起一根洋火！”^[42]当地居民显然没有意识到山林对于水土保持的重要性，愚蠢与迷信对自然造成了严重冲击。山无言地接受人们所施加的苦难，但在危难时刻，山却充当了保护神：“从前他们逃日军时，逃到别的地方去的人都被搜查出来，单有逃进笠山来躲的一批人保了安全。笠山每天牵起很厚很厚的雾，让日本军看不见什么。”^[43]笠山是有灵气的，它默默守护当地居民免受日本殖民当局的迫害。这大概也暗示了，在咖啡种植失败后，人们认识到，必须尊重山的生长运行规律，使笠山以一种全新的面貌重焕生机。“笠山农场，假使让我来整理，我干脆就是造林！”^[44]刘汉杰预言成真，笠山农场在经营失败后，新的农场主刘阿五开始造林，相思树、胡乔木、铁刀木等，而这些树种也是现今高雄美浓尖山的主要林相。

另外，如《登大武山记》中，钟理和歌颂大武山的高大与雄伟，沿途中听到大武山各种鬼怪的传说，唤起他心中敬畏的情愫，而这也是大自然给人类的阻隔，以避免人类去盗取千年古木。但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新伐木工具的出现，大武山的森林资源面临被砍伐的浩劫，钟理和对此掩藏不住内心的担忧。可以说，环境意识的关怀始终贯穿于钟理和的创作，但由于钟理和独特的人生经验，先行研究者更加关注他的民族意识、祖国经验、反封建等面向，忽视了他对环境变迁的深层思索。

林载爵在讨论钟理和的创作时，曾言钟理和文学表现为“在默默隐忍的精神中，所潜藏、表现出来的奋斗意志”^[45]。笠山农场的垦殖虽然失败，但结尾通过重新造林来修复“受伤的土地”。钟理和一生困顿，英年即受肺病所苦，生前仅有一部作品集《夹竹桃》出版，但他不屈服、不妥协，以丰润的情感坚持写作，我们也可以说，钟理和从自然获取对抗挫折的力量，体现生命的尊严。

结语 了解生存场域，与自然共生

环境议题在今天备受关注。钟理和早在20世纪50年代创作的《笠山农场》中，已非常具有前瞻性地书写了人与自然的共生。《笠山农场》中的饶新华是一个“山精”，对山有丰富的知识。他从

不会迷路，会通过树皮向阳粗糙、向阴细腻来辨别方向。他与秃尾狗培养出深厚的感情，训练它去对付坏人、咬绳子。他对山的熟稔，对动物的理解，这种超越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让人猜不透，却值得获取更多的尊重。张永祥忠心耿耿地跟着刘少兴，他相信主人的经营眼光。当咖啡全部枯死后，刘少兴带着愧疚、同情和失败的悲哀糅杂的心情对他说：“你这四年就算白过了！”^[46]而张永祥却说：“可也不算白过，我还学得不少东西：我学到了怎样用颜色由远处鉴别树林里的树木，从前我总当树林只有一种颜色；我又知道人也可以和生物们做朋友，这些生物并不比人更难亲近。”^[47]

可以说，饶新华和张永祥非常了解山的习性，他们真正与山打交道，深切明白土地是居民的养育者。《笠山农场》所呈现的环境伦理观，即要尊重自然的运行规律。面对自然，人类应该认识到自己的渺小，真诚地凝视土地，建立与土地共生共荣的“土地伦理”。李奥波德（Aldo Leopold）在《沙郡年记》中提出“土地社群”（Land Community）的概念，即土地（或自然）由人类与其他动物、植物、水共同组成，人类只是社群中的一个成员，不是生物社群的统治者，必须尊重其他社群的公民并与其他成员互赖共生。土地伦理不仅肯定这些社群成员“继续存在的权利”，也尊重其他成员的“内在价值”，即“生态良知”要把良知的范围从人扩展到土地，摒弃经济上的利己主义，这将有助于维护生态的完整、稳定和美感^[48]。饶新华与张永祥二人，真正践行了“像山一样思考”的行为准则，其间蕴含着生存不只是人类的事，树也需要生存，动物也需要生存，凡能活存的必然有某种“智慧”与“灵”的自然规律。

钟理和是一位农民作家，《笠山农场》不仅是突破同姓婚姻、追求自主爱情的赞歌，也呈现了日据时代农民与土地的变迁，垦殖行动虽然失败，却是农业改革的革命性尝试。战后以“三七五减租”为背景创作的《雨》，一以贯之围绕农民与土地问题展开，深切体现了钟理和根植于乡土与土地的情怀。陈映真甚至认为，有了《雨》的出版，台湾在文学和文化上才真正光复^[49]。《笠山农场》向我们展示了对待土地的多元面相：以刘少兴为代表的

农场主，在权益上和日本人妥协，被迫卷入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不仅造成本地生态的破坏，也导致垦殖行动的失败；以刘致平为代表的知识青年，内心有隐隐的不安，在享受笠山的自然之美时，仍无力改变父亲冒进逐利的垦殖行为；而饶新华这样的“山精”，明白山的习性，谦卑并且尊重生态的运作，遵循道家将自然视为休养生息场所的观念。可以说，《笠山农场》具体而微地体现了人类对待自然的复杂态度，从垦殖行动导致笠山林相的几度变更，充分揭示了经济力量、阶级利益、殖民体制对自然景观的强烈外在干预。进一步来说，《笠山农场》蕴含了钟理和对现代化进程的思考和日本殖民体制的批判，即田园式的理想和传统的乡村生活无可避免地受到殖民与工业资本主义的冲击而瓦解，日本殖民体制对台湾自然环境的宰制、掠夺、改造是造成彼时台湾环境崩坏元凶。

钟理和忠于生活，以人道主义的关怀抒写美浓的山川环境、民歌民风、小人物的遭遇，呈现人与土地的互赖共生，这是他创作的重要意义所在。他回归自然与土地，为台湾文学留下了亲切的注脚。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六十年以来台湾社会思潮的演进与人文学术的进展（1950—2010）”（项目编号16ZDA13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1] 钟铁民：“笠山农场”的故事背景，其实正是钟理和的父亲，我的祖父钟番薯由屏東高树迁到美浓经营山林的经过。”钟铁民：《我的祖父与笠山农场》，《钟理和论述》，应凤凰编，第312页，高雄县春晖出版社2004年版。

[2] 此年代判断的依据：一、刘少兴因日人高崎农场游说，决定种植咖啡；二、小说提及“对于日本政府有无为了某种目的把巴西日侨的事业向国人大肆渲染……”。见钟理和《新版钟理和全集4·笠山农场》，钟怡彦主编，第32页，高雄县政府文化局2009年版。

[3] 托·斯·艾略特：《〈四首四重奏〉之四》，汤永宽译，《世界文学》1983年第5期。

[4] 陈惠龄：《“乡土”语境的衍异与增生——九〇年代以降台湾乡土小说的书写新貌》，《中外文学》（台北）第39卷第1期，2010年3月。

[5][6][7][8][15][16][27][30][31][35][36][38][40][43][44][46][47] 钟理和：《新版钟理和全

集4·笠山农场》，第25页，第35页，第49页，第141页，第39页，第39页，第16页，第133页，第70页，第30页，第58页，第62页，第74页，第135页，第86页，第331页，第331—332页。

[9] 叶石涛、张良泽对话，彭瑞金记录：《秉烛谈理和——叶石涛与张良泽对话》，《钟理和论述》，应凤凰编，第192页。

[10][39] 彭瑞金：《土地的歌·生活的诗——钟理和的〈笠山农场〉》，《钟理和论述》，应凤凰编，第289、293页，第290页。

[11] 参见陈惠龄《抒情意识与现代现实的交会——钟理和〈笠山农场〉的乌托邦叙事美学》，《东吴中文学报》（台北）第27期，2014年5月。

[12] 转引自曾华璧《论环境史研究的源起、意义与迷思》，《台大历史学报》（台北）第23期，1999年6月。原文参见 Donald Worster. *The Ends of the Earth: Perspectives on Modern Environmental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294-303.

[13] 参见费尔南·布罗代尔《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唐家龙等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

[14] 此处转引林益仁《台湾自然保育的“西雅图酋长化”：一个从原住民传统生态知识出发的基进观点》，《中外文学》（台北）第36卷第3期，2007年9月。原文参见 Harvey, D. *Justice, Nature and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 Oxford: Blackwell, 1996.

[17] 参见克罗斯比《生态帝国主义：欧洲的生物扩张，900—1900》，张謇过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

[18] 参见克罗斯比《生态帝国主义：欧洲的生物扩张，900—1900》，张謇过译，第204—250页。

[19] 吴明益：《台湾自然书写的探索 1980—2002：以书写解放自然 Book1》，第214页，新北夏日出版社2012年版。

[20] 参见克罗斯比《哥伦布大交换：一四九二以后的生物影响和文化冲击》，郑明萱译，台北猫头鹰出版社2013年版。

[21] 参见范婷《台湾咖啡消费文化的历史分析》，硕士学位论文，第6页，台湾辅仁大学，2001年。

[22] 参见范婷《从“波丽路”到“星巴克”——台湾咖啡文化的历史分析》，《传播文化》（台北）2000年秋季号。

[23] 参见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附属演习林《臺灣ニ生育ス

ベキ熱帶林木調査 嗜好品ノ一こひ一、かゝを、おり一ふ》，出版地不详，1924年。

[24] 参见三轮勇四郎《珈琲及珈琲樹の害蟲と其防除法》，《台湾总督府中央研究所农业部汇报·第二百二十六号》，第29—32页，“台湾总督府中央研究所”1937年版。

[25] 参见佐藤治稿《臺灣に於ける珈琲栽培の現状と將來》，《台湾金融经济月报》第103号，1938年5月。

[26] 参见矢内原忠雄《日本帝国主义下之台湾》，林明德译，第101页，台北吴三连台湾史料基金会2014年版。

[28] 参见贾德·戴蒙《大崩坏：人类社会的明天？》，廖月娟译，第487页，台北时报文化2006年版。

[29] 参见简炯仁《高雄县旗山地区的开发与族群关系》，第257—258页，“高雄县立文化中心”2004年版。

[32] 吴明益：《一种“照管”土地的态度——〈笠山农场〉中人与其所垦殖土地的关系》，《自然之心——从自然书写到生态批评》，第107页，新北夏日出版社2012年版。

[33] 顾雅文：《帝国与植物学：日本帝国的金鸡纳栽培与“规那学”的发展（1912—1945）》，《东亚环境、现代化与发展：环境史的视野》，刘翠溶、毕以迪编，第227页，台北允晨文化2018年版。

[34] 参见叶石涛《新文学传统的承继者钟理和——〈笠山农场〉里的社会性矛盾》，《钟理和论述》，应凤凰编，第279页。

[37] 弥尔布雷斯：《不再寂静的春天》，郑晓时译，第65页，台北天下文化1994年版。

[41] 钟理和：《故乡之一——竹头庄》，《新版钟理和全集1·短篇小说卷（上）》，第117页。

[42] 钟理和：《故乡之二——山火》，《新版钟理和全集1·短篇小说卷（上）》，第138页。

[45] 林载爵：《台湾文学的两种精神——杨逵与钟理和之比较》，《中外文学》（台北）第2卷第7期，1973年12月。

[48] 李奥波：《沙郡年记》，吴美真译，第321—354页，台北天下文化1998年版。

[49] 参见陈映真《介绍第一部台湾的乡土文学作品集〈雨〉》，《笔汇》第2卷第5期，1960年12月。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

责任编辑：罗雅琳